

遮蔽赤裸之軀 ——工廠民工男女關係探索

◎ 馬傑偉、鄭巧玲

* 本文為刪節本，全文將收錄拙作：《酒吧工廠：南中國城市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即將於2005年底出版）。

本文是關於中國南方民工的愛情、親密關係和婚姻實驗的民族志研究。這不僅是會談和閒話的記錄，也是人們迴斡於傳統標準、現代生活和難以言說的欲望之間的圖景。從2001年到2003年，我們的調查小組定期訪問東莞一家名為永成的玩具工廠。鄭巧玲在工廠當英語教師，馬傑偉的一個研究助手在工廠當了三個月工人，與此同時，馬傑偉和工廠的經理們接觸，並在研究助手幫助下訪問民工。

在我們的研究案例中，民工身處一個不穩定的世界，社會標準尚在形成過程中，或該標準還無法有效規範社會行為。在此處境中，民工身體如何一邊實驗城市的性關係，一邊又擁護傳統的婚姻理念？女工們如何初嘗事業成功又面對遲婚「老處女」的污名？用一個理論隱喻，他們是「赤裸之軀」，袒露著尚未完全被話語接受的身體。中國南方民工身體的「赤裸」雖然是相關特殊案例，但瞬間「赤裸」的經驗，不也是普及地發生在其他追趕性愛和婚姻多元話語的現代身體上嗎？

這項研究的主要「落腳點」是東莞長安鎮上的一家工廠。長安是珠江三角洲地區一個高度工業化但是城市化緩慢的鎮區。它在很短的時間內從一個從事農漁業的鄉村變成工業鎮，絕大多數工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生產。我們的民族志旅程就從這個迅速變化的移民小鎮開始。

一 「談」情「說」愛

在傳統社會，婚姻是家庭親族間的一種經濟社會的合作制度。然而，浪漫和愛情的現代觀念關乎個人追求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純粹關係」¹。進入工廠之後，女工從宣揚浪漫與激情的小說、流行樂、電視節目中學到現代愛情的概念。在我們進行參與式觀察的工廠裏，工人可以從廠內圖書室借書消閒。根據圖書室的借閱記錄，最受歡迎的是愛情小說。在附近的市場有賣舊書和過期雜誌的小攤，大多是些浪漫化的故事和愛情指南之類的刊物。工人也愛讀投合他們需求的雜誌。在這些雜誌中，他們看到其他工人的愛情故事；甚至可以在上面徵筆友，以尋找伴侶或嘗試約會遊戲。讀這些雜誌讓他們彷彿參與其中，有時候還真的能指導他們如何建立新關係。在宿舍，分配給工人的雙層牀上，各人有一個小小的私人空間，裏面很容易就能找到這些小說和雜誌。圖1的工人正在看的那類通俗小說，常常添加了色情佐料²。工人急切地從這些作品裏獲取浪漫愛情的詞彙，以表達他們所嚮往的親密關

係，這種親密在傳統標準裏是無法公開言說的。不過，這些流行媒體一方面描繪情欲，另一方面也充滿了嘲弄色情、譴責濫交、維護傳統價值的道德說教。除了摩登的愛情關係之外，追求真愛常常包裹在穩定忠誠的婚姻理想裏。

「找朋友」是工人最常談論的話題之一。女孩們常常告訴鄭巧玲誰的男朋友寫來了情書或誰最近有約會。當誰找到了男朋友，她就要請同伴吃喜糖慶祝。女工知道鄭巧玲還沒有男朋友，就鼓動她去追求我們的男研究助手文志成。她們說：「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別這麼害羞。」她們還教了鄭巧玲一些策略，比如穿V領衣服，留長髮（鄭巧玲常常穿圓領T恤，頭髮只有兩英寸長）。這些策略不僅是流行雜誌的建議，也來自隨處可見的視覺刺激——滲透在工人生活世界的是充斥於消費廣告中美女酷男的形象，這些男歡女愛的視覺語言既是挑逗也是指南。

流傳於手機間的短訊也可用來談情說性。工人的手機持有率很高，這不光是因為時尚，也因為手機為缺乏正式通訊網絡的民工提供了輔助方案。因為發短訊比打手機便宜很多，所以成為一種非常流行的電子通訊方式。我們發現在工廠區有一些流傳很廣的愛情短訊的彙編小冊子。愛情小說是女工的顧問，男技工則參考這些情欲小冊子。有時候他們複製、發送這種短訊是為了與男性朋友分享戀愛經驗，或向女性朋友表示親昵。他們自己寫華麗語句的語言能力有限，借用這些小冊子，便可複製發送訊息來討好女朋友。這些新詞彙不一定出於民工手筆，也可能是文化商人販賣新潮。無論如何，新詞彙幫助民工清晰思考和表達他們新的城市經驗，使得禁忌與欲望可以言傳。這些短訊使男性的性幻想合理化，例如，有條短訊是這樣的：「男人之四大理想：天上紛紛掉鈔票，天下美男都死掉，美女腦子都壞掉，哭著喊著讓我泡。」這些短訊宣揚婚外情是值得考慮、甚至令人羨慕的：「老婆是家，情人是花；工資給家，獎金送花；病了回家，好了看花；常回家看看，別忘了澆花。最引人注目的哥哥——偉哥；最年輕的奶奶——二奶；最難設防的盜竊——偷情；最熱鬧的走廊——髮廊；最暢銷的書——女秘書。」資本主義、個人主義、風流韻事捆綁成一串，成為傳統婚姻話語以外的另一種選擇。有條短訊說道：「打破老婆終身制，實行小姨股份制，引入小姐競爭制，推廣情人合同制。」很多這種短訊明確地談論民工的性別身體：「女人是用耳朵戀愛的，而男人如果會產生愛情的話，卻是用眼睛來戀愛。」「摸著你的頭，好溫柔；摸著你的臉，好正點；摸著你的腰，好風騷；摸著你的手，跟我走；摸著你的背，跟我睡。」這些短訊編織進民工的日常親密關係裏——使人更自覺地掌握新的性與身體經驗。

二 學習愛

保守主義是保護婚姻的世俗機制。可是，當農村勞動力背井離鄉，從成長的地方拔根，傳統道德價值就失去了戰場，新的親密話語和實踐隨之出現。在工人中間，同居很平常。小敏是永成的職員，兩個月前搬出宿舍和男朋友住在一起。她說：「沒人會說我的壞話。這種事朋友很容易接受。」一個十八歲的永成工人帶他懷孕的女朋友回家見父母，但是父母反對他們結合。他們回到工廠，在街角的診所墮了胎。在長安街上的角落可以看到「平價墮胎」和「治療性病」的招牌。一個永成的保安有超過六個女朋友。他告訴我們他的成功秘訣，「一個人太寂寞了，她們想要男人愛護。這很容易，如果你懂得關心、安慰她們，你就可以摸摸她們。」他熱心地形容女孩的皮膚多麼柔軟，拉著女朋友們的手時多麼快樂舒服。我們問他是怎麼保持多角關係而沒有麻煩，他說：「我們都明白這種關係不會很長，來了，又走了。」事實上，在工廠裏男工人家鄉有個老婆，這裏又有女朋友的現象並不少見。

金獅是工廠附近的一個娛樂中心。年輕情侶在金獅昏暗的光線中擁抱接吻。他們在公共場合大膽地親熱，一點也不擔心會被貼上放蕩亂交的標籤。在金獅，我們看到坐在鞦韆上的一對，事實上，他們面對面坐著，女的挑逗地坐在男友的大腿上。我們問他們是否介意我們拍照，他們一口答允，沒有絲毫尷尬。工人們通過觀看互相學習。一個年輕男孩告訴我們：

「我剛來這兒的時候，看到人們在公共場合親吻就覺得很不要得。現在我也這樣做了，感覺很棒。」傳統道德感對身體的壓抑衰退了。通過模仿，身體開始放鬆，回應新的親密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被消費主義媒體高度提倡，在日常的人際關係裏醒目展示。遷移打破了道德價值的力量，鼓勵個人選擇的關係。身體在調節與學習，欲望被激動與釋放。身邊的參考例子多的是！

在工廠區，公共廣場的舞池是個人化與性別化的身體進行社會展示的地點。在長安，最大最近的舞池是城市中心廣場。晚上，官方單位在廣場大型露天舞台廣播兩個小時流行舞曲，工人可以免費去那裏跳舞。當夜幕降臨，各個工廠的工人聚集到舞池內。有的穿上長裙或緊身T恤牛仔喇叭褲，搖身一變成為派對女郎。我們多次參與這種舞會並認識了很多工人。白天，他們穿工廠制服；在舞池，他們穿上漂亮的衣服展示個人風格。農村環境裏的身體受大家庭集體影響，在辛苦的農事勞動中磨損老去。城市環境裏，養護身體的產品、服務「更新」了工人的身體。在舞池裏，工人體驗新發現的能力——打造性感身體、裝飾外型、訓練儀態，把自己直接暴露在朋友和陌生人（尤其是異性）敏銳的凝視之下。朋友和陌生人的界線是模糊的。人們手拉手跳舞，互相學習最新的舞步。他們來這裏看，也被看；欣賞風景，又構成風景。我們這些新來的研究者也在體驗著新環境、學著新舞步。一些有經驗的工人教我們基本步法。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主動性身體概念在此就派上用場³。身體並不是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話語中的耗盡狀態，而是隨著動態的社會交互作用主動地保持準備狀態。為避免因舞步笨拙而遭人嘲笑，舞池中的每一個參與者都努力學著舞步混入人群，創造新動作以張揚個性，身體在公共舞蹈中主動創造了意義。

在弗蘭克（Arthur W. Frank）的類型中，這些正是努力創造自身的「言說身體」⁴。弗蘭克認為跳舞是言說身體的場所，因為舞者用他們的身體互相遷就和配合。在長安的舞池，舞者們展示一個充滿溝通意態的身體，因為那裏不像傳統社交舞那樣嚴格約束不同性別的舞姿，民工有充足的空間去創造自己的身體姿勢。這些身體體驗沒有視覺話語作參考，舞者是在互相學習自創步法。換句話說，這個言說的身體正在經歷「赤裸」的狀態。農村轉向城市時，身體「赤裸」面對公眾視線，這是一種虛懸的過渡。民工在臨界狀態下表達個性。雖然尋找婚姻對象的傳統欲望可能仍是幕後的一種動機，這些舞動的身體無法遏制的是狂歡的、視覺的、公共的和性感的愉悅。通過言說的身體，民工在社會能接受的舞步掩飾下，釋放和投射他們的性幻想與城市夢想。

三 搖擺於田園與城市之間

在城市，民工暴露在一套全新的關於親密關係的話語中，他們渴望在日常生活嘗試這種新的關係，但是，民工有一種獨特的生存狀態。他們清楚明白自己很可能會回到鄉下老家，那裏的婚姻規則仍然是十分傳統的。這一種城與鄉的反覆，不同於農村身體在漸進的城市轉型中學習現代生活以及慢慢定居下來。民工不一定留在城市。農村身體暴露在城市的情欲刺激中，個人化的愛情與娛樂規訓民工的新生活，但他們心中也總存在著一種可能性，就是將要返回熟悉的、看起來很有安全感的大家庭傳統。身體存在於渴望現代和回到傳統的中間地

帶。這是寓居於短暫的打工生涯時空瞬間的「赤裸」身體。

在「赤裸」時刻，民工渴望尋歡作樂。工廠女多男少，要在工作地約會男友不容易。因此在雜誌上針對工人群體所設的徵筆友欄裏，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句子：「那人在信上飄蕩；那心在動；那情在信中揮灑；那刻，只有我和你。」「楓葉經霜才會紅，梅花經雪才會香，你願意與一個桂林女孩在彩虹般的天空下共討人生的奧秘嗎？」「千里有緣一線牽，有緣與你相識嗎？請來信吧！」⁵。在筆友欄登過徵友啟示的阿紅告訴我們：「我真的很想嚐嚐愛情的滋味。」但是，當一個長期筆友寄給她一盒巧克力並向她表示好感的時候，她卻猶豫了。

「我很怕他是個花花公子，怕他會傷害我。再說，每次我打電話回家媽媽總是叮囑我不要跟男孩約會。」離家六年後，她最終決定回家相親。雖然愛情是個重要的日常話題和新的關係形式，但大多數女工的最終命運還是回家相親嫁人。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將矛盾話語壓縮到民工身體，體現了「赤裸」延長加強的狀態。

強化的「赤裸」狀態是由民工所面對的特殊社會文化約束所構成的。鄉村和城市網陣的散漫力量貫穿了民工的生活世界，現代與傳統的價值不斷鼓勵和懲罰身體。民工沒有一套穩定的規則與標準、沒有確實的社會角色與期待、也沒有清楚的文雅與粗俗的界線，身體無法隨機應對社會接觸，只得以一種「赤裸」的狀態考驗日常生活的生存策略。親密關係的現代話語與城市話語也許會改變傳統性別角色。不過，傳統制約會以多種多樣的道德輿論出現。在其他研究中，娛樂與閒話據說可以將越軌行為模糊化，並將當事人投入可被接受的人際安全網，因此閒言閒語被視為容納非傳統親密關係的途徑⁶。但是，在我們的研究中，閒話是用傳統道德「遮蔽」「赤裸」身體的有力形式。雖然民工在一個遠離家鄉的地方被去傳統化，但閒話仍能穿越廣大的社會網絡捕獲遷移的「逃亡者」。

阿梅的故事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她是個二十七歲的已婚婦女，每月五百元的工資比在家鄉當廚師的丈夫還高。雖然比起回鄉當個家庭主婦，她更喜歡在長安的永成工廠工作，可是來這裏六個月後，她還是決定辭職。因為在她離開三個月後，老家那裏就散布了她和工廠一個男人有染的消息。傳言透過斷續耳語和手提電話短訊在鄉里網絡傳播。為了證明自己清白，她不得不回家鄉做回一個賢妻良母，而且把四歲大的兒子留在家鄉也令她覺得內疚。她不止一次向鄭巧玲哭訴：「別人一定會說我這個做媽媽的太差勁了。」但是工廠裏的男工卻很少有這種負罪感。當我們問起男工想不想家，他們大多會說，「這就是生活，我能怎麼辦呢？」好父親離家賺錢養家是能被理解和接受的。但女人離家賺錢養家，就會被懷疑是個壞母親和不忠的妻子。

許大姐的故事很能表現農村女孩在現代和傳統的十字路口所感到的迷惘和無所適從。她是包裝部的監工，二十七歲，初三學歷。她是關於女人如何能在現代社會奇跡般改變命運的絕好例子。九年前，一場大旱毀掉了收成，這個農家女不得不去工廠做工。現在她的月薪在一千元左右，她回家時坐得起飛機，經濟條件比家鄉的親友充裕得多。在經濟發展方面，許大姐完全放棄了在家相夫教子的傳統準則，她擁抱了使自己成功的現代觀念。「我怎麼可能回家在毒辣的太陽下種田，每年就只賺二百元？」她說。但是，身為單身女人，她也陷入了親戚閒言碎語的困境中。從六年前開始，許大姐每年過年回鄉都要相親，但她的經濟能力遠超同齡的一代，附近村落的男人不是農民就是工人，沒有一個與她匹配。如果現代性是一種選擇能力，許大姐並未完全享有現代女性可以選擇單身的特權。經濟上來說，她可以自己養活自己；思想上來說，她也知道甚麼是職業女性。當其他女孩子催促鄭巧玲找一個男朋友的時候（她們知道鄭巧玲二十九歲，單身），許大姐有時就會教導她們：「現代女性是可以單身

的。」但是單身從來都不是她的選擇。傳統使用閒話、歧視、無稽之談和道德規條來規訓主體。許大姐告訴鄭巧玲，鄉民們都叫她「老怪物」。雖然她在經濟上成功，但在村子的蜚短流長裏，她仍然是個失敗者。阿清說：「就算是白痴（低能兒）也能找到丈夫。」換句話說，單身女人，在鄉村話語中不是成功人物而是怪異的失敗者。「老姑婆鬼」的故事也顯示了單身女人所受到的歧視。阿亮和阿麗告訴我們，「在我們家鄉，如果一個女人四十歲還嫁不了人，她就會被趕出家鄉，因為鄉民們相信她死後會變成『老姑婆鬼』，你知道，『老姑婆鬼』是很猛的。」像這樣的無稽之談將單身女人邊緣化為罪人／鬼怪，她們不僅自身失敗還傷害別人。當受到自由主義觀念的挑戰，傳統機制就使用道德教條規訓人們結婚，並把女人拉進有束縛力的社會關係網。

四 回 家

如果忽視了回歸傳統婚姻的迫切要求，我們眼見耳聞的民工多姿多彩的故事就無法充分顯示其中的矛盾。愈來愈多民工（特別是男民工）永久留在城市，但到撰寫本文為止，仍有相當比例的民工面臨著無可避免的回鄉命運；而事實上，有些民工是欣然回鄉的。一些打工的女孩高高興興回鄉在鄰村找個丈夫，相親被看成自我保護的實用策略。就像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民工離鄉別井和在短時間內經歷急促轉變，某程度上擺脫了傳統道德教條的束縛。但是，在中國南方，對民工來說，這種遷移有時是短暫的。民工要永久定居於城市並不容易，當工廠和餐廳不再僱用他們，就不得不回家。女工回鄉的壓力比男工更甚。

在長安工作的情侶所面對的現實難題之一就是決定回誰的家。阿英是江西人，她男朋友是湖南人。他們在永成工作的時候認識和相愛。她告訴鄭巧玲雖然他們深愛對方，但是她看不到兩人的未來。「我們在長安的時候很好，但是我們不可能永遠在這裏。我是父母心愛的女兒。他是家裏的長子。兩邊父母都希望我們回家，這讓我們左右為難。」去年春節，為了見雙方父母，阿英和男朋友十三天的假期在路上就花了六天。事實上，很多情侶在一方要回家的時候就分手了。

遷移和流動為親密關係的現代觀念創造了空間和機會，但遷移也將民工從社會網絡和安全保障中拔根。大多數民工為要養家把工資寄回家鄉。他們微薄的工資在中國南方也很難養活自己。低學歷、經濟不獨立、缺乏工會和法律保護，民工不得不屈從於名目繁多的剝削，只能以傳統社會網絡為保護機制，親密關係也不例外。

阿清告訴鄭巧玲一個故事，「在我們村有個花花公子，他和工廠裏一個四川女孩結了婚，這個女孩跟他回到我們村。不久，這個男的就虐待她。因為她離家太遠，沒有家人給她撐腰，後來這男的和她的離婚了。她身無分文，孤立無援。我父母總是叮囑我不要嫁給外省人。」監工許大姐也解釋了為甚麼她從沒考慮嫁給工廠裏和她經濟水平相當、經歷相似的管理層男人，「如果他不再愛我怎麼辦？我該向誰求助？」傳統社會網絡提供了安全保障，特別是對女工來說。女工確實覺得墮入愛河很浪漫，但是她們大多數人還是選擇相親。陳玲拒絕在現實生活中實踐現代愛情想像，因為「如果他騙我怎麼辦？如果他拋棄我，我該去哪？」傳統包辦婚姻對她和其他很多女孩來說不是壓迫制度，而是保護制度。對女民工來說，遠嫁他鄉不是浪漫的旅程，而是危險的賭博。

民工大部分是女性，但男民工也經歷傳統與現代的矛盾。男女的經歷不太相同，女工回鄉的壓力比男工要大，亦較易惹來「壞女人」的指責。然而，本文並非關注性別的不同，而是對「赤裸」狀態作理論描述。民工的旅程不是由農村到城市的單程旅行；這也不是一次往返旅

行，因為他們經過城市洗禮之後也並不完全傳統。無論是男工抑或是女工，他們都經歷一種介乎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赤裸」狀態。

五 結語：赤裸之軀

中國南方的民工被扔到了一套關於性愛和婚姻的充滿矛盾的話語中。他們個人化的親密經驗必須在回鄉時摺疊掩蓋進傳統農村網絡裏。民工販賣勞力和青春，年滿三十的工人常常被勞動力市場拋棄。他們充分意識到自己必須回家的可能性。民工在這個特殊的反向軌跡中是「赤裸的」，他們離開傳統婚姻制度的保護罩，將身體轉變成適合城市生活的個人化外殼，但是他們的轉型是徘徊在城與鄉的反覆流動，因而將遷移的身體遺留在赤裸的矛盾中。民工的感官身體變成了他們體驗性愛與婚姻競爭話語的中心舞台。這一身體既不是福柯意義上規訓的產物，也不是戈夫曼意義上那大方得體的主動性身體，而是類似於弗蘭克指出的處於形成過程中的「言說的身體」。肉體在理性鐵籠之外感受自己。我們想指出的是，這些特殊社會群體獨特的赤裸狀態，事實上並非特例，而是某程度上有其普遍性的。生活在城市現代性瞬息萬變環境中的我們，大都不時面對著相同的瞬間「赤裸」經驗，其中可用的話語互相矛盾，且無法以流行形式言說個人身體的愛欲經驗。

最後，我們以一個女工的故事結束本文。她的名字叫陳玲，是我們的受訪人、舞蹈老師、朋友和筆友。我們在研究完結時去找陳玲道別。這是我們在該地的最後一次訪問，鄭巧玲買了條白金項鍊送她作為結婚禮物。午餐時間，我們在工廠門外等她。陳玲在午休時間出來，她仍然穿著制服，白色工作帽覆蓋了她的美麗長髮，漂亮的臉上帶著親切笑容。這年春節，她就要回家和安排好的對象結婚。她覺得那是更有保障的生活。她也有過掙扎，但是回家是必然的。她在城市廣場的舞台度過了美好的時光。在我們的記憶裏，陳玲有點像灰姑娘，因為在廣場舞池第一次見到她時，她穿了襲銀色晚禮服，跟穿工衣的她判若兩人。她在《打工妹》雜誌上登過徵筆友啟事，幻想美妙的愛情故事，亦真的引來不少愛慕者。然而，她最終決定在體驗了大開眼界的城市生活後返回家鄉。我們在工廠門前道別。她在遠方的家鄉和長安現代小鎮之間生活了六年。六年的城市經驗化為她自身的一部分。她在十字路口送別我們的情景將會是我們珍貴的回憶，而她站在十字路口的畫面，亦是現代身體如何在（後）現代愛情多元話語迷宮中協調自身的一個理論隱喻。

註釋

- 1 Anthony Gidde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 本文所有照片均由謝至德拍攝。
- 3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1973).
- 4 Arthur W. Frank, "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 in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ed. Mike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1991), 36–102.
- 5 摘自《打工族》和《大鵬灣》的「筆友」廣告。
- 6 James Farrer,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馬傑偉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傳播學部主任

鄭巧玲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哲學碩士，美國愛荷華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總第九十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